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著名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和教育家,《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本的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被师生校友们亲切地称为“望老”。他一生“严”字当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为人学为师,常葆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老校长虽已离开我们47年,但他清正廉明的佳话仍被莘莘学子传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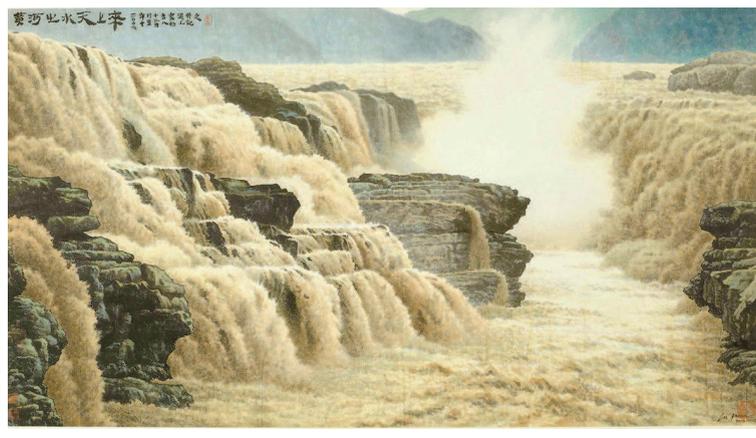
望道先生清廉事琐记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1920年的早春,29岁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老宅弃用的柴房中,全然不顾春寒料峭,“进修马克思主义,试译《共产党宣言》”“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在望道先生笔下,信仰这个“怪物”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问及当年他冒着各种危险首译《宣言》的缘故,望老答道:“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

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望老一生做出的重大选择都是首先从政治角度考虑的。1922年10月,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接办上海大学,学校的一系列进步举动引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制,不少知识分子对上大“望而却步”。1923年秋,一张署名“知名”的匿名纸条被秘密地送到陈望道手中,内容是:“上大请你组织,你要来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看到字条的字迹便知道是陈独秀写的,后来他对

周 晔

学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要我去做的,我就要去”。陈望道不仅兼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还先后接任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为党保护和培养了大量青年干部。1952年11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有关方面按照政策为先生安排住所。为便于跟复旦师生员工联系,他们就找了位于国福路51号的一幢三层西班牙式小楼。一开始,望道先生怎么也不肯搬入,说自己只是一家三口,住不了那么大的洋房。1955年,校方几经劝说,最后决



黄河之水天上来 (中国画) 吕吉人

定将校内的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安置在底层作为办公用房,望老才勉强同意住进它的二楼。这个研究室后来改为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成了师生同仁日常学习、工作和望道校长接待外宾等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望老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但对亲属却是“铁面”无私。望老是当时复旦唯一有专车的校长,寓所侧边还建有车库,但他从不公车私用。有次儿子陈振新动手术后需要去医院复诊,不便乘公交车,秘书蓝聚萍建议请司机老魏送一下,望道先生决然说:“不可以,叫他自己乘三路有轨电车去。”陈振新高考首选交大,然而当年却差了3分,有校领导悄悄暗示望老找人破格予以招录,陈望道对“开后

门”的建议一口回绝。陈振新大学毕业后先被分配在上海铁道学院工作,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当时望老已是耄耋老人,丧偶后无亲人陪伴,学校党委曾多次提出把陈振新调来望老身边,他总说不要特殊,直到1965年陈振新才从铁道部调往复旦。入职复旦后陈望道特地找儿子谈话:“你现在来复旦工作,我们很高兴,但你要好好工作,一般复旦老师犯了错误可以原谅的事情,你也不能做。”陈望道的外孙女曾提出,希望望老能设法把他们调到上海来工作,也都被陈望道一一规劝和回绝了。陈望道表外甥张希福曾回忆,每次说起想让他介绍亲属孩子到上海工

作,陈望道马上就会严正警告:“找工作、找关系的事情,千万别找我,我是不会帮忙的。”1977年,得知陈望道病重,说话都已很费力,张希福等义乌乡亲到上海探望,“他告诉我,回家乡后一定要告诉村里人,只要读得起书,一定要读书;读不起来的,就学一门手艺,否则以后会很困难在社会上立足。”如今国福路51号的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内,展陈着陈振新夫妇珍藏的陈望道“1976年大病后留言”的遗嘱。这封信笺至今读来仍让人泪目:“振新吾儿,良玉吾媳同鉴:……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另外,家中诸物和留有少数稿费,望你们斟酌使用,我的藏书请送复旦大学。”望道先生一生俭朴廉洁,临终留给子媳仅“少数稿费”,他送给复旦大学的藏书却多达近两千册,最后儿子儿媳把书和书柜一起送给了学校。此外,1965年复旦大学60周年校庆需要修建校门,望道先生拿出多

我家里每个角落都有书,加上意大利家里的,有几万册。搬家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其他东西可以扔,但书不能扔,通常是我到哪里书到哪里。早年在鲁迅文学院读的书,在复旦上学时读的书,跟着我到了英国,到了意大利。有的书打包邮托,但像《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老残游记》,还有海明威的书,我都随身带着走。

我读书比较杂,什么都看,别人推荐的我会看,与写作有关的我会看,关于种植技术的我看,疾病的书、吃喝的书我都看。外国文学书籍可能多于中国文学的。《黑镜头》一套我全有,《简爱》《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书都给了女儿。还有《纳尼亚传奇》的第一个版本,已经磨损了,我重新修复后给女儿看。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会反复阅读。英文版《情人》我读得最多了,《红楼梦》我也读了N遍,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读了很多次,博尔赫斯的书每隔一年就会读一遍。这些书也比之前读给我更多的精神营养。福克纳的书读过几年就不喜欢了。村上春树的书越来越喜欢。重新读《山海经》,深受启发。

读书必须读完才对得起它。以前我有一个特殊才能,看书过目不忘,尤其对数字,天赋很好,我看一本很厚的小说,几乎能背下它所有的对话。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都不会记错,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本书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阅读笔记我做得很少。

我记住的,不仅是书里的故事,也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老人与海》的内页有翻译家的签字。这个签字其实是送给我以前的男朋友,男朋友又送给我的。翻开这本书时,当时的情境就出现了。一本书,一个作家,有许多记忆。我读格林的小说,喜爱傅惟慈的译本,准确精美。有一天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心中难过。他曾经多次穿过一个大公园,从他儿子家走到我家来聊书,他的博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看书先看开始,然后看最后,接下来才是看中间部分。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快速发现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书,是一条捷径。

年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解决了预算不足的问题;美化校园、栽种紫薇抑或是特殊时期受到冲击的复旦教授经济拮据等,望老总是慷慨解囊,予以资助,留下了无数“在我的心目中,师生总是占第一位”的佳话。陈望道同志毕生恪守“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人生信条,始终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述望老首译《宣言》“真理之甘”的故事,2020年6月27日给《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师生回信,更勉励我们“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嘱托师生继续讲好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这些都为新时代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提供了根本遵循。

吃完晚饭,从冰箱里拿出邻居用酱油和盐腌制的青萝卜条,吃上两根,这一顿饭就很“落胃”了,美味。

我突然想起三个字,立刻打电话给美食家兼美文家建星:你不是一直在写有关吃的文章吗?提供给你一个选题:“塞塞口”。怎么样?建星说:你是最适合写“塞塞口”的,自己写吧,心意领了。

好吧,那就自己写:外地有朋友到上海,我总是请他们到德兴馆去品尝上海菜:草头圈子、八宝辣酱、响油鳝糊、红烧鲳鱼、青鱼秃肺、菜心走油蹄……吃到大家满口流油、打起饱嗝之时,我会点一大碗面。服务员问:要啥浇头?焖肉面?辣酱面?我说:光面,什么都不要浇。

光面上桌,寒酸吗?不,反响异常地好,你一筷我一筷,几分钟就见底。我笑了:请你们吃了那么多道上海名菜,难道不如一碗光面——其实,这碗面就是所谓“塞塞口”,要的就是它的清汤寡水。至此,这顿饭圆满收官。

外地朋友到上海,我绝对不会请他们到小绍兴去吃三黄鸡,我请过一次,那位山西朋友非常疑惑,问:这三黄鸡什么佐料都不放,就这么清水煮熟,就这么光光地拿来叫人吃,厨师也太省心了吧?

要吃三黄鸡,我一般和家人或亲戚去,明明知道店里提供不了走地鸡,也拿不出散养的谷饲鸡,但是过个几个月总忍不住要去吃一趟它白净的鸡肉,还有那一小碟鲜口的酱油。全部吃完,我便要了一碗白粥——这就是所

“塞塞口”

童孟侯

谓的塞塞口。也许鸡肉吃多了容易反胃,要用这碗粥塞住它。

中国南方人有“塞塞口”的习惯,外国好像也有“塞塞口”。中国人塞塞口的往往是咸食,否则压不住阵脚,外国人则往往是甜点。我的一个同学到欧洲某国参加一个什么会,晚上,主办方请他赴宴,很隆重地发来请帖。提早一小时就入座了,侍者给他倒了杯开胃酒,然后给他一只不知用什么东西炮制的橄榄;足足等了60分钟,总算喝上了一盆汤,接下来又是等啊等啊等。终于等到上热菜了:鹅肝、蜗牛、青蛙腿、生蚝、牛排……每一道菜都很地道,每一道菜都只有一点点,每一道菜间隔时间相当长。

我的同学没等到第二道菜上桌,第一道菜已经消化掉。酒倒是

足够供应,每位来宾面前放着三四个酒杯,据说吃白肉要喝白酒,吃红肉要配红酒,吃海味要喝白兰地,要按照规矩喝。我的同学不屑一顾,心想:倒在胃里都是酒。

终于,上冰淇淋了,每人发一个银质小勺,一点一点抿着吃——这就是外国人的“塞塞口”了。洋人们觉得吃到冰淇淋算是吃舒服了,有回味了。

当然,不要以为用甜点“塞塞口”对中国人来说行不通,慢慢就会了。譬如在麦当劳用餐,吃了滚烫的炸薯条、滚烫的牛肉汉堡、滚烫的菠萝派,最后最好来一个冰凉的蛋筒冰淇淋——这就是用甜点来“塞塞口”。

如上小文不是美食家建星写的,我来写总觉得中气不足,只能在文末向读者诸君请教:第一,这“塞塞口”一说,是不是宁波人“发明”的?是不是宁波人才习惯那样做?第二,有人说“塞塞口”三个字应该是“刹刹口”,哪个才对?

建立自己的自信,从此环卫工们振奋起来。“依想想,阿拉这种工作!”看他这样大声反复地说,我在脑海里推测着是哪一位同事做的好事,一面也是感动着的,几十年前的事啊!当年我们弄堂口的公共厕所和垃圾集散地,是著名地标,不久前看到年轻同事撰文忆当

切,就像数着我们共同历经的风雨阴晴,嬉笑悲欢。回到家,我把这本书找出来,纸页泛黄了,最朴素的筒装,软软的,翻起来很方便。读着,欲罢不能。忠实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和他人,点点滴滴记下我们对人生的追求,对爱情、亲情、人情的理解,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的希冀。故事远去了,真情仍在,即便今天,仍愿珍惜和向往。记得,国门初开时,我非常羡慕人家克数不等的铜版纸,羡慕人家期刊的精美图片、高级油墨……想着什么时候我们的杂志也能有这样的承载。但如今常常会浮现脑海的,却还是当年那些印在粗糙的再生纸上的故事。

高山路包含杂志社旧址的那一片,又被围起来了。再打开时,必定有新的建筑耸立,往日不再。但我还会去走走,我的记忆在等着我。

亲爱的张秋生先生,他是带“我”出道的恩师,他的晚年做到了“重回童年”,请看明日日本栏。

总有回忆穿过世间

孙小琪

年,也是一定要把这两样大书写一番的。那时我们编杂志,日日纸上谈兵,和建筑工地不在一个维度。只是,在弄堂深处的办公室,常常也是没日没夜的。很多想法,很多故事,很多憧憬和希望,和几十万读者交流,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回归常识,合理地生活,幸福地度日。1995年《现代家庭》创刊10周年时,我们从120期杂志中挑选一些富有情感或哲理的精炼散文,编成小书,书名冠之以《絮语碎言》。还记得编选过程是一件有点沧桑感又有点七彩纷呈的事,做起来感觉很亲

一个对聊天者而言绝

在熟悉的人面前

詹政伟

她是我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将近三十年了。那年,因为喜欢我的一篇小说《麦子熟了的时候》,远道而来,相隔数千里,辗转找到我,诉说内心的激动,说其中的女主人公,写的全是她的故事。其实,我压根儿不认识她,而她坚持认为我写的就是她。我拗不过她,便默然写的是她。自此,她成了我的读者。她说,她一直在沿用这篇小说女主

人公的轨迹生活。她喜不自禁地说她的成功,丈夫成了著名教授,四处讲学;儿子事业有成,在美国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儿媳是美国帮儿子带小孩了。她谈到他们的时候,脸蛋发红……我祝贺她。她充满感激,说没有那篇小说对她的鼓励,她不可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她让我说说,一定要说说。

但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熟悉的过往,似乎牵强附会,于是我只能说说我自己,我说我的波浪形的忧伤,我说我的波浪形的心情,结果说着说着把她给说哭了。其实我也只是问她,你现在还看不看小说?她笑着说,早就不看了,哪有时间啊。我沉默了一会儿对她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爱好丢掉了,那等于是把一个人的灵魂丢掉了,人在这世上,不就图着自己的一点爱好,才活得有滋有味?她说当下你为什么还在谈文学理想和文学事业?你就不能说说我们大家都感兴趣的房子、票子、车子、儿子、股票……我轻轻打断她说,没办法,谁让文学是我的“宿疾”呢?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在疗伤。



十日谈

生命中的光 责编:殷健灵